

申遗成功别“忘形”

据《京华时报》报道,7月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48项。此次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湖南、贵州两省实现了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

世界文化遗产,听起来自然“高大上”,说起来国人也有“面子”,评上了自然皆大欢喜,但对地方政府来说,千万不要轻易斥巨资无节制地开发,最终破坏了遗产的本来面貌。申遗成功意味着保护的升级,而不是过度的利用。既然叫遗产,那么一定是留给“子孙子孙”的,而不是在这一代就“吃光占尽”。

老年大学很火爆

据《现代快报》报道,近日,江苏南京市金陵老年大学开始了2015学年度的报名。尽管报名时间是下午,但有数位老人前一天夜里就赶来排队。到第二天清晨,排队人数已达几百人。而一旦入校,许多老人便“不肯”毕业。最长的已在老年大学读了20多年。

老年大学的火爆或许恰恰证明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乏味。退休在家,总想找点事儿做吧,于是学唱歌跳舞、绘画摄影、电脑英语。说到底,老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既能有所学,又能相互交流沟通的平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应越发引起关注,类似老年大学这种平台,相关部门应致力于“多多益善”。

舞台安全最重要

据媒体报道,7月3日晚,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歌唱比赛,当土建学院的学生在台上演唱《地道战》时,疑似因为摇晃太剧烈,导致后方舞台突然坍塌,后三排学生瞬间“消失”,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当然是偶发事件,但近来类似的舞台不牢靠,导致台上演职人员瞬间跌落,或者户外攀爬设施不牢靠,导致攀爬者掉到地上的情况已有数起。这也给相关活动的组织者、承办人提了醒儿,庆祝什么、玩什么,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之一。“豆腐渣”、“棉花套”,只会让喜剧变成悲剧。 □林琳

预装软件:消费者只有默默承受的份儿?

□本报评论员 林琳

信技术有限公司为被告,诉讼理由是这些厂商生产的手机预装软件多且不能卸载、偷跑流量等,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时下,“低头族”成为一族,足见智能手机的魅力。手机可以购物,可以看电影电视,可以做理财交易,似乎打电话、发短信反倒成了次要功能。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超过了5亿,成为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那么,这5亿名智能手机使用者是否在畅享各种便利、迅捷的同时,也隐隐地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有程序在后台偷偷运行、消耗流量?又是否会纠结,为什么有些手机自带的自己并不需要的程序、软件卸载不了?

对不少手机用户来说,上海市消保委的此番实验给出了部分答案。在上海市消保委送检的20款手机中,除一款无法开机外,其余19款手机都预装了软件,最少的27个,

最多的71个;有3款手机无法卸载任何预装软件,其余16款手机可卸载一部分;在接受检测的10款手机中,偷跑流量的有9款。

预装软件过多,还偷跑流量——“土豪”自然可以无视,可这并非仅仅是钱的问题。为什么手机一定要预装消费者不常用甚至至根本未使用的程序或软件?预装软件的背后谁在得利?“我的手机”为什么不能完全我做主?偷跑流量产生费用,一些商家与“小偷”何异?这是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的问题,也是公平交易权的问题。

媒体的报道显示,预装软件发生在多个环节,有些是手机出厂时厂商预装的,有些则是经销商预装的,包括一些销售定制机的运营商。有些经销商的手机销售价格之所以低于直营店的价格,原因就在于预装软件后从软件商那里拿到的回扣可以填补这个差价——用户每点击一次相关应用,经销商就

能获得1元~1.5元的回扣,软件留存率越高,商家获得的利润就越大。换句话说,手机厂商、经销商和软件商之间的利益合谋,使预装软件市场形成了隐形的产业链。而每一个智能手机用户都成了“待宰”的小羊羔,厂商也好,经销商也罢,已为手机用户准备好“草料”,要么吸费吸流量,擅自收集手机用户信息,要么植入大量广告,以此牟利。

事实上,工信部于2013年已经发布了相关通知,明确了生产企业不得在移动智能终端中预置的五类软件。不过,这一规定仅对手机厂商进行了约束,且未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惩罚措施,而预装软件的利益链涵盖了运营商、各级经销商、软件商等多个环节,要想彻底整治,仅凭一纸公文显然力度不够。近年来预装软件的问题虽饱受消费者诟病仍稳如泰山,亦侧面证明了相关监管的乏力。

5亿智能手机用户,绝不是小数目,但在强势的商家面前,消费者有时只能默默承受那些霸王条款和霸道行径。从更健康的市场发展、更和谐的消费生态的角度,向一些行业潜规则和顽疾开刀,实乃必须,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亦实属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市消保委的此番公益诉讼开了一个好头,它的示范意义值得所有消费者、消费者组织乃至相关监管部门认真领会并有所作为。

“现在的景区纪念品都长一个样”——近日《人民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现今在全国的许多旅游景点,纪念品普遍存在着同质化、低端化的问题,没有特色、缺乏创意。在沈阳故宫、东陵公园等景点,10元一条的手串、5元一本的明信片及20元一个的纪念水杯随处可见,但质量不容乐观。而在一些高档商店,上千元的木笔筒、玉器及玛瑙摆件又让人望而却步。

在旅游业日益繁荣的当下,公众和媒体的眼光多聚焦于旅游景点门票的降低、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而小小的旅游纪念品也是景区必不可少名片,不仅承载着美好的旅游记忆,更代表着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如今游客的抱怨亦是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份善意提醒,在景区硬实力建设的同时,更应注重增强景区的软实力。而如何让纪念品变得既有特色又质优价廉,或许就是软实力建设中不该忽视的一点。

□李法明/图 超超/文

一顶帽子大家戴

昌大学来说,早在前一任校长时期,南昌大学就曾通过有关部门对省内媒体发文照会,称南昌大学简称一律使用“昌大”。而其校歌亦云,“巍巍昌大宏图启,弦歌既倡薪火继”。如今怎就摇身成了“南大”?另一方面,对于南昌大学来说,似乎气度也可以更宽厚一些,简称不会飞出银河系,多具有地域性特征。譬如提起“华师”,就有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武汉市民首先会想到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市民会想到华东师范大学,广州市民则想到华南师范大学。各叫各的,也不见得就天下大乱。

名,口口相传之间,岁月流转之下,不过

以调查论证还原婚姻“杀手”真相

□冯海宁

民政部日前发布《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有专家称,“我们从一些律师事务所了解到,在离婚官司中,一半以上的都涉及婚外情。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就更可能成为诱发婚外情的工具,变为婚姻的‘新杀手’。”(见7月5日《新京报》)

离婚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此,网友与专家多从制度、社会角度来讨论分析。在有些人看来,制度变化被认为是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以及新《婚姻登记条例》简化离婚手续,助长了离婚。而社交软件容易引发婚外情,也被认为是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其实,导致离婚率连增的原因细说起来能有一箩筐。譬如:由于购房等制度不完善,出现“技术性离婚”,即以离婚方式钻制度漏洞;明星、富人以及某些官员视婚姻如儿戏,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由于女性地位提高,经济独立,对婚姻依赖性减弱;婚姻自由主义盛行,对年轻人婚姻观影响很大……

细说起来,婚姻“杀手”很多,当然也包括现行制度、社交软件等。但需指出的是,制度本意是维护婚姻正义、社会公平,而不是有意

伤害婚姻;各种社交软件本意是促进沟通交流,而非故意引人出轨。所以,不应简单指责某些所谓的婚姻“杀手”,而需要全面、深入调查。哪些原因是主要“杀手”,哪些是次要的,这样一来,从社会层面挽救婚姻时才有轻重缓急,而对不同的离婚原因进行论证和分类,则有利于“对症下药”。

控制离婚率增长,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比如,影视剧创作人员能否少一些对离婚问题的渲染,避免影视剧中过度渲染离婚可能造成的受众婚姻观念、家庭责任逐渐淡化,再比如,一些媒体为吸引眼球,过度炒作公众人物婚姻问题,多少也有负面效应,理应适当克制,多些社会责任。

对各级政府来说,可作为的空间也很大。比如强化对官员的教育和约束。数据显示,被查处的不少贪官都有情妇,腐败领导干部中也多与“包二奶”有关。这无疑会增加离婚率,再比如,一些媒体为吸引眼球,过度炒作公众人物婚姻问题,多少也有负面效应,理应适当克制,多些社会责任。

对各级法院来说,可作为的空间也很大。比如强化对法官的教育和约束。数据显示,被查处的不少贪官都有情妇,腐败领导干部中也多与“包二奶”有关。这无疑会增加离婚率,再比如,一些媒体为吸引眼球,过度炒作公众人物婚姻问题,多少也有负面效应,理应适当克制,多些社会责任。



□李法明/图 超超/文

高校简称,“舌尖上的名校”之争

□邓海建

6月底,南昌大学发布由江西省教育厅核准发布的章程,将“南大”定为自己的学校简称。7月2日,南京大学有关方面回应,“学校已向教育部、江西省教育厅表示了严重关切。”媒体从教育部了解到的态度是,希望南昌大学、南京大学能规避引发校名争议的情况出现,协商妥善解决此事。(见7月5日《新京报》)

大学的简称,就像江湖花名,既朗朗上口,又能把不谙内情者唬得一愣一愣,因此,但凡段位较高的名号,谁也不愿任其沦为“分享模式”。何况,中国人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

名分之重要性不言自明。从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南京大学的“严重关切”,当然,也更容易理解原泸州医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爱恨情仇。

此前,因泸州医学院更名为四川医科大学而成为新“川医”,遭致老“川医”(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校友反对,向教育部正式提出行政复议。而新“川医”部分学生听闻校名有难,更是在“图书馆门口坚守几个小时,坚持维权合法合理的更名。”

为了名号,大家都是蛮拼的。如果从名声等同于节操的逻辑看,捍卫简称也是要紧之事,但问题是,这种论争究竟意图在何?比如“南大”之争,一方面,对于南

中国军队打退了日军的坦克进攻,以血肉之躯,筑起让敌人无法逾越的长城。

抗战到底

卢沟桥和宛平城是出入北京的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七七事变’是在日本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点可以从事变后的时间轴清晰看出。”谢荫明说,从“七七事变”整个过程来看,日本军队从蓄意挑衅到寻找借口,直至提出无理要求,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超出了当时中方的容忍底线。事变爆发并非偶然。根据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日军获得了平津线一带驻军的权利。“七七事变”前一段时间,日军以丰台驻地不够居住为由,提出在丰台与卢沟桥之间修筑兵营和机场,遭到拒绝。之后,日军无视中方抗议,在卢沟桥附近加紧军事演习,由白天演习发展到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发展到实弹射击。

日本人为何如此想霸占卢沟桥?从当年的地图上可以看出:此时北平城事实上已三面陷入日伪包围,只剩西南面尚有29军驻防,宛平一失,平汉线被切断,北平将成为一座孤城,守住卢沟桥,就是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

日军以演习为借口,经常到宛平城、卢沟桥一带活动,侦察地形,并多次与29军发生争执。进入1937年夏天,日军加大挑衅力度,战火已一触即发;当年6月,驻丰台日军一部以攻取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进行演习。6月21日,日本中国驻屯军紧急成立了临时作战课。《金井武夫回忆录》记载,东京流传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

就在“七七事变”前一天的7月6日,日军不顾大雨泥泞在龙王庙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性演习。同时,一队日军要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演习,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遂在城外进行部署,威胁守军,双方相持十几小时,日军退回丰台。

面对紧急局面,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加强了戒备。谢荫明介绍,负责具体防务的金振中对部队进行了针对性部署,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金振中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战的斗志。

7月8日,“七七事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八年抗战,由此开始。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南大学:见义勇为成为一种风尚

新华社长沙7月6日电(记者谢樱)主动捐献造血干细胞,暴雨中为昏倒女子撑伞半小时,勇救落水农妇……今年以来,中南大学学生的诸多先进事迹,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在中南大学校园里,还有着数不清的温暖故事。

记者了解到,被誉为“最美毕业生”的尹琨,并不是中南大学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首例。2012年,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博士生莫森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实际行动践行职业语言。2009年,中南大学硕士生刘子建捐献造血干细胞,被赞“最美新娘”。

见义勇为的事迹在中南大学还有很多。去年11月15日,中南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冶金环境学院辅导员等救助车祸受伤学子;今年4月27日,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郑均勇救落水儿童;今年5月8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委副书记薛志敏教授、第三党支部书记肖树刚主任护师在长沙飞往大连的MF8035航班上,救治癫痫症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仅近年,中南大学就有30余名师生直接参与到18起见义勇为事件中。

多年来,中南大学的师生们第一时间挺身而出,驰援全国各地救灾,已成为学校的传统。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紧急组建抗震救灾医疗队,赶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工作;2015年6月2日,由6人组成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专家医疗队赴湖北省利川县,开展倾覆客轮获救伤员救治工作……

在校内,慈善互助活动数不胜数,往届毕业生也是中南大学师生关爱的对象。2014

教育部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教育部网站6日消息,教育部通报了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有3起涉及公款旅游问题。

这3起公款旅游问题分别是,2013年7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公款出国旅游问题;2013年7月,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下建筑与工程系外出开会期间组织公款旅游问题;2014年11月天津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李伟锋以考察交流为名组

是个音节罢了。它背后承载的价值与担当、情怀与操守,才是最值得薪火相传的“瑰宝”。有媒体统计称,近6年来,我国共有472所大学更名,占高校总数的23%。将近四分之一的所高校在名字上玩“美图秀秀”,将各种名号拼凑,弄得考生及家长傻傻分不清。眼下的高校简称,不过也就是一场场“舌尖上的名校”之争——争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荫凉荫蔽,争的是“名声大了好伸手”的资源话语,与中国高校的人文梦想有何干系?

在去行政化与力避千校一面的路上,如果中国高校的精力仍靡费在虚名浮利之上,那么高校的生存与发展将何处安身,又何以安顿?

“中南大学为何有这么多的好人好事?如果真让我找个原因,可能就是出于中南人固有的爱心、责任、善良和担当。”勇救落水农妇的秦露露同学告诉记者,她曾经因为家境困难交不上学费而要放弃攻读读研究生,导师不仅极力劝阻,还自掏腰包为她交了研究生的学费,让她感动不已。

“正是因为在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大环境里,当你见到需要帮助的人,你伸出援手就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秦露露说。

典型人物辈出,是一代代中南人积淀起来的优良文化为其提供了沃土。正如一名网友评价道:“一种文化积淀一种品格,优秀品格才能孕育高尚的行为。短期内,在同一所高校,集中发生三起救人事件,看似偶然,实有必然。”

“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和道德高地,理应肩负起弘扬正气的重要责任。”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高山表示,中南大学长期注重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不断涌现的大学生道德模范群体和个人,与中南大学‘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向善求真唯美有容’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联。”

“大学要成为正能量的传播源。正能量多一点,社会风气就会更好一些。当越来越多的向上、向善、向美时,我们社会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自然就成为一种风尚。”高山说。

另外两起分别是,2013年9月,同济大学离退休工作办公室虚报冒领退休职工慰问经费违规发放津贴补贴问题;2014年11月8日,北京交通大学后勤服务产业集团副总经理杨金泉借女儿婚嫁违规收受礼金问题。

据通报,一些涉事人员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留党察看、行政警告等处分。应由个人承担的旅游费用已退还。

无法忘却的那一天

——全景还原“七七事变”

新华社记者 陈新洲 肖春飞 闫祥岭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飞机坦克来勿怕,大刀挥起敌人跑!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这是北京档案馆珍藏的《卢沟桥歌》词曲,作于78年之前“七七事变”之后,78年过去了,这首歌中透出的悲壮与豪迈,仍让人动容。

1937年7月7日,农历六月廿九,历史奔流至此,瞬间迅猛改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抵抗外敌入侵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为惨烈的战争,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赢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由此开始。

挑起事端

站在今天的北京宛平城墙下,仍能看到78年前的弹孔。家住卢沟桥畔85岁的郑福来老人回忆,“七七”当天晚上,他在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翌日早上一枚炮弹在自家北房西侧爆炸,小伙伴四子被炸死。

史料记载,7月7日上午,日军到卢沟桥以北地区进行演习。下午,日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由丰台兵营开到龙王庙,声称进行夜间演习。

“龙王庙位于宛平城西北,距离仅有千米,而且龙王庙内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在此夜间演习,显然另有企图。”平西抗战研究者张东升说。而清水节郎在他当天的日记中这么写道:“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

日本人打破了这个寂静的夜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点40分,在宛平城东北日军演习方向响起一阵枪声。随后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硬说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遂包围宛平县城。

午夜12时,日方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就“日

本兵失踪事件”提出交涉,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士兵。时任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拒绝日方的进城要求,但为了协商解决,告知日方“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兵,即行送还”。

据时任宛平县长王冷斋的《卢沟桥事变始末》等史料记载,秦得纯随即要求驻守宛平的部队严密戒备,随时准备应战,并指示王冷斋“迅即查明,以便处理”。经查明,中国军队并无开枪之事,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

事实上,日军所谓“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很快就归队了。当年中日关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松本重治在自己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如是记述:“这个日军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七七事变’关键人物之一,日军第八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1938年6月30日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也坦承,当时已接到士兵归队的报告。

日军在进城搜查被拒绝后,立即开枪示威,并向城内发射炮弹。潜伏在铁路东侧的日军轻重机枪及山炮一齐向宛平城开火,中国守军被迫还击。

奋起反击

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出乎日军意料。29军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在宛平城居民的协助下,把城东门堵紧,城西门只留下一条缝隙供人出入。29军的大刀队,继长城抗战后,又一次让日本人魂飞魄散。为拖延时间,日军诡计百出,一再提出谈判,又不断撕毁协议。

7月8日凌晨2时,日军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兵力配置,部队集结在卢沟桥火车站西南方,随时准备开战。凌晨2时3分,日军占领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

日本人已经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却以和谈之名,调兵遣将。“其实在中日双方开始谈判前半个小时,日方已经得到了这名失

踪士兵归队的报告,却仍以这个理由坚决要进入宛平城。”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说。

8日凌晨3时,中国代表到达北平日本特务机关进行谈判,4时左右,中日双方代表进入宛平城谈判。同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隆一郎也在天津召开会议,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凌晨5时,接到命令的日军再次向宛平城发起了进攻,谈判中断。守城部队即刻还击。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日军未能前进一步,日方谈判代表见事态不妙,遂手持白旗登上宛平城墙,日军借机停止射击,双方又开始谈判。

7时30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命令在秦皇岛的部队返回北平。

9时30分,日方再度攻打宛平城和卢沟桥。金振中带着两个连队,反击围攻铁路桥东端的日军,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日军被击退到2里之外,收复了铁路桥东段,战况稳定下来。

“在停战协议不断签订的同时,战斗也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宛平城和卢沟桥有坚固的城墙和石桥为依托,日军多次进攻未能得手,于是他们把突破口选在了卢沟铁桥和龙王庙一带。”谢荫明说。

16时,日方让中方代表出城谈判,遭到拒绝。17时,日方再次派人送信,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中国军队限时撤退等要求。未收到满意的回复的日军于18时5分炮击宛平城,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专员公署成为一片废墟,大批民房被炸毁。

王冷斋曾回忆一个细节,可见日本人的狡猾:日本派出的三个谈判代表步行进入宛平城时,用步履丈量了宛平城县公府大厅距离城墙的位置,然后将信息传给城外的日本人。谈判过程中,日本的第一枚炮弹就越过宛平城墙,准确无误地炸在县公府里,企图以武力胁迫中方退让。

中国人誓死不退。29军大刀队强袭龙王庙,不到2个小时就夺回了龙王庙阵地。守城